

【编者按】

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是实证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直面一切我们愿意看到或不愿看到的现实社会问题。

为了认识和理解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对相关人员进行接触并开展深入访谈，通过这些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他们在谈话与表述中带有某种情绪，言词有些偏激，观点并不正确。社会中一些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也十分正常。研究者可以通过交谈，更进一步了解对方所持观点的信息来源、理解他们的思考逻辑、分析如何才能使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逐步引导他们在正确的思路思考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回避或漠视这些现实问题，不仅无益于这些问题的正确引导和早日化解，反而会造成一些错误观点的继续蔓延传播，对社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如果采取简单的做法予以排斥，则可能激发反弹甚至激化矛盾，更不利于矛盾的化解。

我们在《通讯》中介绍一些关于青年或在校学生的访谈报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信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青年学生的现实思想状况。

【调查报告】

部分维吾尔“民考汉”在校大学生对一些问题的认知 ——基于个案访谈的分析

唐元超¹

所谓“民考汉”是指自幼上汉语学校并用汉语与汉族学生一样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少数民族学生，后来泛指一切上汉语学校的民族学生；与之相对的概念是“民考民”（迪木拉提，2001）。随着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民考汉”群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²，因其在理论上作为“维-汉两种文化”的承载者和“多元族体资格”的行动者而备受关注。³一些学者归纳了这一群体在对待语言文化上的矛盾性，表明其存在“逆向文化冲击”的尴尬，同时利用心理学的方法证明了“民考汉”群体存在内群体的认同和我文化的偏好，试图为被贴上“汉化”标签的该群体“辩护”（孜维达等，2014）。也有学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该群体作为文化“边缘人”和“中间人”的两种面向，指出因基于民族身份的制度安排使得该群体虽然融入了主流社会，但依然保有其族群性基础（祖力亚提，2009a）。还有学者利用“知识分子亚社会”的理想型对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培养体系发问，“中国各族的知识分子们是否在知识学习和文教科技事业的工作中获得了超越‘族群意识’的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否构建出一个超脱本族群利益和传统思维的‘知识分子亚社会’”？表示了对于我国民族教育体系在知识分子培养方面的深切忧虑（马戎，2013a）。

显然，在目前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大家（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更关心“民考汉”这一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急切地想要获知这一群体“忠诚”于谁，作为民族

¹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² 2015 年，新疆全区学前和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少数民族接受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 224.93 万人，占该年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的 78.85%；而双语教育和“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在 2010 年时为 48.0%。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http://www.xjedu.gov.cn/xjjyt/sytj/index.htm>

³ 这里之所以强调在“理论上”的可能，是因为“民考汉”群体内部的地域、阶层、社会化的基本场景（学校、专业等）以及其他因素的多样而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性，在“实际中”是否可以发挥这一作用则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分析。



知识分子的他们，到底在民族发展和族际沟通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到底是整合还是区隔？

事实上，在对以上问题回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避免将其做“对象化”的理解，忽视其行动的内在意义和真实感受——因为人类生活是一套有意义的内在结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外在方面观察和把握人的行动”，而且要求“从内在方面理解人的行动”（韦伯，[1904]1988:13-15）。为此，笔者于2016年5月选取了北京某所985高校10名维吾尔族学生进行深度访谈¹，试图从“认同”的问题意识中脱离出来，以“认知”为切入点，借助于个案的鲜活性和启发性，利用“拓展个案”的方法，总结出这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相关问题认知的不同特点，以展示维吾尔族大学生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次访谈的维吾尔族学生大都来自于该校某地域文化类社团，笔者曾作为该社团的会员，与所有访谈对象具有长期、密切、友好的互动，确保了访谈内容的真实性。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前四个部分渐次分析了该群体对于语言、伊斯兰教和新疆宗教政策、维吾尔族历史以及其自身未来生活预期等方面的态度和认知，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与讨论。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专业	生源地	是否为内高班 (括号内为上学地点)
01	男	20	社科	东疆县城	是(上海)
02	男	20	社科	南疆市区	否
03	男	20	理科	南疆农村	是(江苏)
04	女	21	理科	南疆农村	是(山东)
05	女	20	社科	北疆县城	否
06	男	21	社科	南疆农村	是(天津)
07	女	20	社科	南疆市区	否
08	女	30	社科	南疆农村	是(浙江)
09	男	26	人文	北疆县城	否
10	女	27	人文	南疆市区	是(辽宁)

一、对语言的认知和态度

从关于“民考汉”的定义可知，其基本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受教育过程中使用哪种语言。一些研究表明“民考汉”群体对于母语和汉语之间有较大的矛盾心理。由于学习母语时间较短，该群体对母语（主要是读和写）和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不够；但是作为认同和归属的重要载体，母语又显得尤为重要，该群体对于母语具有强烈的热爱之情，对于自己母语能力较弱表示“惭愧”，希望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加强母语，并且以后要注意自己孩子的母语教育（希日娜依，2001；李儒忠，2013）。

在访谈过程中，所有人都称“维吾尔语”是其“母语”，是自己作为“维吾尔族”的重要特征，是自己在维吾尔社会获得认可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将其学好，这其中还透露出对母语可能“消失”的深切忧虑；同时，他们表示汉语和英语作为工具性语言，也需要学好。“在中国，不学好汉语是不行的”，“要了解国外，不学好英语是不行的”，展现其对待语言的宽容态度和积极心态。

¹ 该校不招收“民考民”学生，这10名学生都是“民考汉”学生（包括内高班），其中男生5名，女生5名；所学专业包括法学、公共管理、新闻、信息管理、医学、人类学、考古等（见表1.受访者基本信息）。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调查对象的数量和抽样的方法，本文不做推论总体之用，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总体，但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



编号 01: 以前我的初中母语老师告诉我, 联合国把维吾尔语列为五百年内会消失的语言, 我听到了特别心疼, 非常担心母语就此消失了。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因为我想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 都是具有很强包容力的语言, 语言都是融合而成的; 历史上, 哪怕是我们最强大的时候——喀喇汗王朝时期, 我们也大量提倡双语、三语教育, 当时人们大量吸收波斯语、阿拉伯语, 但这并没有影响维吾尔语的发展, 反而使它更加丰富了。……我在家的时候家里都不允许说汉语, 说维吾尔语或者英语可以, 但不允许说汉语。

编号 02: 有人说维吾尔文化会消失, 但我觉得所有的文化至少都会有所变迁,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历史就是这么发展的。我对维吾尔文化还是充满自信的, 以前有个学长告诉我, 维吾尔文字是一种城市化的文字, 与现代社会很契合, 它也是像拉丁字母这样的拼音文字, 很适合现代的计算机发展。

编号 03: 我的维吾尔水平还可以,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在民语班上的, 初中才去的内初班。……至于我和“民考民”比, 当然是不如他们。但我觉得我学维吾尔和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主要是能够说、读、写就好了, 因为维吾尔是我的母语, 我必须学好; 他们因为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因此对维吾尔的文法之类要很了解。对我而言,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 除了学习维吾尔以外, 汉语和英语作为两个很大的语言, 必须也要学好, 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编号 04: 我觉得以后我的孩子能和我一样就行了, 幼儿园的时候送去双语学校, 以后都去汉语学校, 能把两种语言都学好。

已经有学者从语言同时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交流学习工具的双重性出发, 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在语言选择上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参考模型(马戎, 2010)。然而, 根据本次访谈,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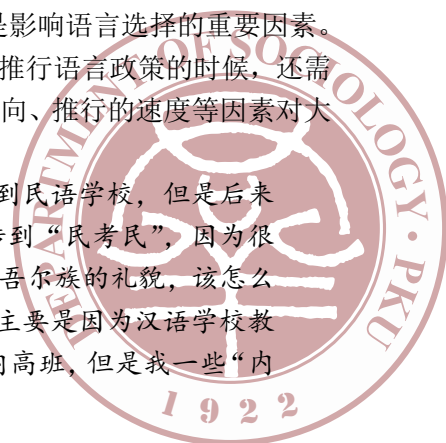
第一, 人们在选择学习语言类型的过程中不一定会考虑如此长远, 往往只是根据当地社会的一般看法来抉择, 如很多人表示“民语学校教学质量差, 学习氛围不好”, 这是比较普遍的说法;

第二, 在实际生活中, 有时候限于客观条件而没有选择, 这些客观条件包括: (1) 行动者所处的阶层, (2) 其掌握信息的充分度, 以及 (3) 当地资源的可及性。一些受访者表示, 小时候进入“民考汉”学习之前需要经过考试筛选, 如果家庭教育或其所处的社区中没有汉语教育, 是无法通过考试的; 还有一些受访者说自己“小时候在村里没有汉语学校, 只有部分老师和汉族才会把孩子送到很远的汉语学校”。

第三, 其选择还受到行动者赋予语言背后意义的影响, 在我国目前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当中, “语言”是作为“民族”的构成要素之一,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民族, 其背后不仅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还包含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气质”、“情感”, 以及“认同”。在访谈过程中, 有好几个受访者都提到自己在初中时候, 家长考虑将其从“民考汉”转到“民考民”, 其原因是孩子在“汉族学校不懂礼貌”、“性格张扬”、“穿着暴露”, 担心孩子“变得和汉族一样”。显然, 这里的“汉族”作为一个形容词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因此,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普遍看法以及民族间的关系, 也是影响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语言的选择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算计”的产物, 因而制定、推行语言政策的时候, 还需要将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大环境考虑进去, 应尽量避免由于政策的导向、推行的速度等因素对大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编号 05: 当时我读到初二初三的时候, 他们考虑过把我转到民语学校, 但是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那时候好像是一个热潮, 很多人都想把孩子转到“民考民”, 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母语都不怎么会了, 性格也不太好, 不懂维吾尔族的礼貌, 该怎么说话也不知道。现在, 大家基本都还是把孩子送到“民考汉”, 主要是因为汉语学校教学质量更好, 民语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初中以后, 我也打算去考内高班, 但是我一些“内



高班”的朋友告诉我“内高班”现在没有那么好了，于是我就放弃了，没去考。（**哪些地方不好呢？**——笔者问，下同）这些学生的身体不好，大学招生政策也不好¹。

编号 06: 当时我们家里面，上汉语学校的就一个，主要是一些老师或汉族把孩子送到那儿去上学；其他那些学生都在自己村子里面那些维语学校上学。以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村里面的学校都被合并成为一个大学校了，现在维语班和双语班都有，之前没有双语班。

编号 10: 当时我上的是汉语学校，因为离我们家比较远，爸妈觉得不太方便，于是就把我妹妹送到了离家比较近的民语学校。

虽然很多受访者被问及母语水平时，都或多或少表示“惭愧”或“遗憾”，这也为以往的研究所证明；但需要细致区分的是，这里的“惭愧”具有两种向度：其一，认为语言是自己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因缺失语言而感觉自己的认同不完整，因而感到“惭愧”，这透露出回答者倾向于将民族看成一个客观实体而非关系性的、具有主观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其二，这只是当被问起时的“礼节性”回答，被作为自己母语水平不高的“合理性说明”，因为只有这样回答才符合提问者的期待，即认为“维吾尔族 = 会说维语/读写维文”，尽管可能回答者并不一定如此认为。这反映出回答者更倾向于从“心理认同”的角度来定义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而非基于“语言”等客观要素。因为对“什么是维吾尔族”这一问题的标准不一，所以才出现了“民考汉”群体是否“被汉化”的长久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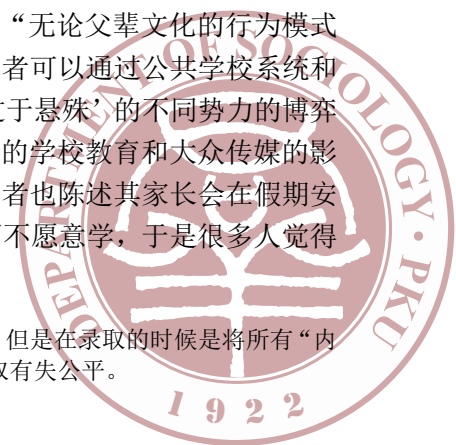
编号 06: 我感觉只要母语在，就表明我是一个维吾尔族呀；如果没有了母语，都不算一个民族了。比如回族吧，我有一个回族同学，他觉得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他自己就会说“回族是什么啊”，他特别看不上回族。所以我感觉语言就是民族的一个代表。

编号 05:（你刚才说自己为母语水平而惭愧，是当别人问起你时才觉得“惭愧”呢，还是自己从内心就觉得“惭愧”？）实话说，一般都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才会这样觉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买了维语的书来教我学，但是我当时也没怎么学，不感兴趣；上了高中以后他们就不再管我了。但是我现在觉得维语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大家会觉得这是我的母语。因为别人一问我是什么民族呀？我说是维吾尔族，人家就会接着让我说几句维语，写几个维文来看看，这都是套路的；要是我啥都不会，凭什么来说明我是维吾尔族呀？

编号 10: 在我上小学那会儿，民族小孩儿要进入汉语学校是要经过考试和筛选的，所以能够进入汉语学校学习的人，都会有一种优越感，上学以后能够把汉语说得很好就觉得特别前卫，所以当时我都不愿意说维语，也不愿意和维族小孩儿玩。好多人都不愿意学自己的母语，都习惯了用汉语交流、读书，看一些汉语频道之类。

一些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对母语和汉语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一些人表示小时候“不愿意说维语，喜欢说汉语”，因为这样显得“酷”；上大学以后“觉得维语很重要”、“说维语的时候就想起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站在家长的角度，他们时时担心孩子的语言问题，试图通过家庭教育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正如戈登对美国移民及其后代的观察那样，“无论父辈文化的行为模式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如何持续地争夺着对移民子女的影响，后者可以通过公共学校系统和大众传媒把自己的观念强行施加于年轻人一代的认知……在这个‘过于悬殊’的不同势力的博弈之中，输赢是毫无疑问的”（戈登，[1964]2015：97）。这说明在强大的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单单依靠家庭教育难以解决孩子母语学习的问题。很多受访者也陈述其家长会在假期安排自己学习母语，但当时自己往往不觉得重要，或是觉得“很难”而不愿意学，于是很多人觉得

¹ 这里所说的“招生政策不太好”是指“内高班”虽然被分到不同省区参加高考，但是在录取的时候是将所有“内高班”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来录取，她个人觉得各省的试卷难度不一，统一录取有失公平。



自己目前母语水平很低。

编号 07: (你爸妈把你送到“民考汉”, 会担心你的语言问题吗?) 他们也担心, 但是觉得语言只要靠家庭教育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小时候他们在家就和我讲汉语, 希望加强我的汉语能力; 等到我小学毕业, 汉语学得差不多了, 他们就不许我在家里用汉语了, 一定要说维语。如果我说汉语, 他们就用维语告诉我,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假期的时候, 我妈妈就让我把维语字母抄写几遍, 看一些维文的书。

然而, 一些例外的案例显示出, 很多人母语学习的成功并非通过家庭教育, 而是在社会交往中感到社会的“压力”之后开始的。如编号 08 这样, 从小便是“民考汉”, 后来经过内初班、内高班, 长期远离家庭, 并且在正规教育中一直缺乏母语教育, 因此其母语的读写能力比较差; 但毕业后回到维吾尔聚居区, 经常会有人问到其母语水平, 这使其感到较大压力。这说明, “民考汉”学生在与他人交往互动中, 民族的“自性”会被所处的情境不断确立起来, 只要生活在维吾尔族的团体之内, 母语往往被周边人们不断强调, 不管自身是否愿意, 学习母语都是融入这一民族团体的必要步骤。

编号 08: 研二的时候, 我是日语班班长, 经常有人找我辅导课程。我在给一个男生上日语课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你学习又好, 长得也漂亮, 性格也好, 就是有一个缺点”。我问是什么缺点, 他说: “你母语太差了!” 我就解释说, 因为我从小上的汉语班。他却反问道, “难道你父母没有教过你吗?” 我听到这个特别生气。我小时候爸妈因为我课业压力很重, 都不敢再给我什么别的压力了, 没有特别强调我的母语。……

还有一些事, 比如我们举办一个活动需要签到, 我就问他们, 可以用汉语签字吗? 他们说, “难道你连自己的维语名字都不会写吗?” 这些事情经历多了, 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另类, 处处碰到他们的红线, 让我自己感到不舒服, 这个时候, 我感到自己融入这个圈子很重要。于是, 我就找了一个很好的闺蜜, 她是学维吾尔民间文学的, 我说我可以给你钱, 你教我维语吧。她特别高兴地对我说, 只要你肯学习, 我一分钱都不要, 保证把你教会。

可以看出, “民考汉”学生对于母语具有较强的情感倾向, 而对于除母语以外的语言, 如汉语和英语, 则具有较强的工具倾向。该群体对母语的態度也历经了一个变化, 随着其年龄的增长, 对于母语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并且期待自己的下一代能够学好母语。

二、对伊斯兰教及新疆宗教政策的认知

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一些宗教行为和节庆已经和民族风俗习惯融为一体。近年来南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倾向受到人们关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加强了对这一倾向的干预, 相继出台了“两文件、一条例”¹; 与此同时, 一些学者也提醒应当注意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 在宗教问题的实际工作中要注意区分宗教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宗教保守主义产生的“现实土壤”, 即维吾尔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挫折(吐尔文江, 2014)。在这部分中, 我尝试回答的问题是, (1) “民考汉”学生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什么? 其态度如何形成的? (2) 对于他们而言, 宗教有何意义? 其内部是否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3) 他们如何看待新疆目前的宗教形势和宗教政策?

(一) 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 重信仰, 轻行为

¹ “两文件、一条例”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伊斯兰教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修订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 参见: “新疆自治区正确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政策”, 新疆日报网, 2015-6-29, <http://china.takungpao.com/xinjiang/2015-06/3035567.html>

一般认为建制性宗教包含“四要素”，即：（1）宗教的观念或思想；（2）宗教的感情或体验；（3）宗教的行为或活动；（4）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吕大吉，1987）。从本次访谈来看，所有受访者均表示“伊斯兰教”更多表现为一种内在的信仰，“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是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在外显的宗教行为上，如“念、礼”等则基本没有实践，或者很难坚持；而像“斋”这样的宗教功修，也往往被赋予更为世俗的文化意涵。这部分群体属于比较典型的“文化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编号 03：我平时一般不做礼拜，但是周五会去清真寺，和朋友们一起。平常感觉没有时间，如果遇到周五刚好有考试、踢球之类的，我也就不去了。（**你是否会觉得平时没有礼拜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怎么看吧，古兰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真主不会让你做不方便的事，所以我相信真主是不会怪罪我的。

编号 04：家人希望我好好做礼拜，我一般在家也每天做五次礼拜，只是晨礼太早了，我做完以后就去接着睡觉，然后再起来吃早饭。在学校里我做的很少，感觉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

编号 05：平日里我一般不做礼拜。（**那你斋月封斋吗？**）我会的。虽然他们说斋月封斋是一种善功，但我也没这么想，只是觉得有这种忍饥挨饿的体验是好的，更能够同情那些经历饥饿的人；同时，斋月的时候会分发一些食物给别人，这是一种善事。我觉得我们宗教里也有很多好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穆斯林”并不是说这一群体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相反，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伊斯兰教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宗教信仰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诚信”、“有道德”和“受眷顾”等美好的意义，这往往是与“没有信仰”的汉族相对照而言的，“没有信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其背后透露出的意义在于，“没有信仰”意味着“不遵守基本原则”。

编号 10：小时候家人会用一些宗教小故事告诉我们哪些该做，哪些是好的，这就是把宗教很多东西放到了伦理道德中去。至少在我的脑海中，宗教是很美好的。……但我平日里不做礼拜，家人只是教育我要遵守宗教里面好的价值理念，至于礼拜这些外在形式则没有太多要求，对我们挺自由的，更多是相信我们，尊重自己的选择，只要不违背观念就好了。

编号 05：我依然觉得宗教信仰很重要，伊斯兰就是“和平”的意思，它告诉我们要乐于助人，要有善心。我爸爸就经常说，有宗教信仰就有了行为的准则，汉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才会什么都敢做，假冒伪劣、道德滑坡之类的。我理解宗教就像一根绳子一样，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我觉得伊斯兰教像中东那样是很不好的，他们信的比较愚昧。

其二，一些人将伊斯兰信仰当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庭传承”，其宗教信仰是自己“出生于维吾尔家庭”而奠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部分人认为“伊斯兰教”已经和“维吾尔族”紧密相连、难以切割，并且“穆斯林”是其建构民族身份的重要元素。因此，此时的宗教仪式要么作为一种“习惯”而被践行，要么作为一种“需要”而被强化。但当询问“伊斯兰教为什么对自己很重要”这一问题，很多受访者表示“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这表明虽然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族有紧密联系，但这更多是出于“朴素情感”，是一种“自在”、“自为”，而非“自觉”状态。

编号 08：从我自身来讲，因为我是维吾尔族，一出生就在穆斯林的家庭中，所以我就信仰伊斯兰教。但是我缺乏宗教实践，平时基本不做礼拜。假期在家，爸妈会叫我去做礼拜，但是我一般都起不来。只有在我心烦的时候做一做礼拜，这样会感觉内心会安宁，比如我离婚那段时间，每天基本都做礼拜，有时候都做五次。一般情况下，我



是每天做一次礼拜，早上起来就做，也不一定按照晨礼的时间，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哪天没有做的话，反而会不舒服。

还有一些人则不认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民族身份是不可选择的，但是信仰伊斯兰教却是可以自我选择的。前者对于宗教的理解基本上属于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后者则是对伊斯兰教有一种理解上的“自觉”。编号 01 和 05 虽然都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穆斯林，但是都对于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反对原教旨主义，强调面对信仰时候的独立思考。

编号 01：我偶尔去清真寺，但是去得很少，所以我经常感到内疚，觉得以后我死了肯定会下地狱。但是我爸也告诉我，一些人虽然每天读古兰经、做礼拜，但他们心里没有安拉，照样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中有安拉，这比什么都重要。每当我要面试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祈祷安拉，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眷顾我。……我特别反对圣战，我觉得他们（ISIS）管的事太多了，不应该去干涉那些不信教的人，这不是他们可以管的。要是每个人对别人都充满包容就好了。

编号 05：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还挺不合格的。按理说，真正的信仰就应该相信安拉，但是有时候我会去质疑，比如会想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安拉主宰的？感觉自己不坚定，有时候自己不太认同一些东西。比如一些保守主义者告诉我说女生不应该穿得太暴露、不应该穿高跟鞋之类，我就觉得这很扯。他们说穿黑袍和戴面罩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就觉得他们这样说不对，要真的是我们的传统，就不会有那么绚丽的艾德莱斯绸了。有一次我在我们那边坐一个老人的脚踏车，他竟然对我说，“我们民族都在进步，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拖我们民族的后腿”，他的意思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的那种穿着是我们民族的进步，而像我这么穿就是民族的倒退。他这么理解，我想我就没必要和他争辩了，简直没法沟通。对于这些说辞，我一般都不管。

其三，伊斯兰教更多体现在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一些禁忌上，如作为清真饮食习惯的解释。这部分群体对于“清真”有自己的理解，认为需要在不同情境之下做出一定变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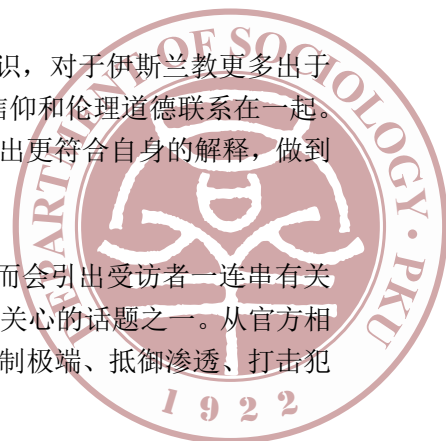
编号 02：家里对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是让我不要太过分了。比如，至少我吃饭还得来这样的地方（清真餐厅）吃饭吧，至于其他就没什么要求了。……我听别人说过一句话，“清则净，真则不杂，合为清真”，我很赞同这种说法，清真需要自己去判断。

编号 08：平日里，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每次聚餐都因为我一个人而去一些清真餐厅，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提议说，我们别去清真餐厅了，去吃一下火锅、韩餐之类的吧，北京的清真餐实在是太难吃了。我想我本来是少数，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现在反倒是我搞特殊了，平日里大家都那么尊重我、将就我，我为啥不能牺牲一下自己，尊重一下大家呢？我拣自己能吃的吃就好了。你说我对于清真这个问题变化了吗？我觉得没怎么变，一旦我有条件选择清真餐厅，我肯定还是会去清真餐厅。但很多时候没有条件，或者需要适当做出让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总体而言，“民考汉”学生由于很少有机会接触伊斯兰教相关知识，对于伊斯兰教更多出于本民族的朴素情感，对于宗教更倾向于做世俗化的理解，往往将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但同时，由于其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他们对于宗教信仰可以做出更符合自身的解释，做到“不盲从”、“不盲信”。

（二）对新疆宗教政策的评价

当被问到新疆的宗教政策如何时，听到最多的是“不自由”，进而会引出受访者一连串有关宗教政策的看法，这表明新疆地方政府的宗教政策已经成为该群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从官方相关报道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遵循“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



罪”的基本原则，加强了宗教事务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2016）。虽然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主义”，但在“自治区11号文件”的百题问答中如此对待这一问题：“暴力恐怖案件与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极端思想有什么联系？——答：暴力恐怖案件几乎都从非法宗教活动开始，利用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分裂理念、发展组织成员、引发共鸣、最终实施暴力恐怖活动。”¹换言之，二者的区分在当前背景下意义不大，并且是“暴力恐怖活动”的“初始”。从发布的文件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态度总体是严厉打击“三非”活动（包括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和极端势力，一些受访者表示政府的这些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编号03来自和田，他认为通过目前政府的一些引导，人们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加有自我的理解了；同时宗教人士由于接受了一些培训，其水平也得到提高。

编号03：现在人们对于宗教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了，大家都知道要去读古兰经，而不是光听别人怎么说。另外，当地的阿訇也会定期去银川或北京参加培训，对于古兰经的解读更加正确了。……宗教方面，宗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管理宗教的时候，总是将宗教问题看得很严重，进而有了很多过分的规定，这最终会导致反抗情绪的，更加恶化局势。

与此同时，他也觉得宗教是新疆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反而恶化了局势。这种看法受到更多受访者的支持，他们表示地方政府可能“过度执法”，其基层执法人员在管理宗教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化、功利化和表面化做法，使得这部分学生感到“管得太严”、“上纲上线”，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产生抵触情绪。

编号07：（新疆的宗教政策怎样？）很严格，太严格了！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示，我感觉自己回到新疆就懵懵的，感觉四周都是压抑的，到内地就好了，因为内地什么都不限制。……我特别想做礼拜，但是我们那边太严了。……因为我是学生啊，学生不是不允许信教吗？难道没有这样的规定吗？学生都不让进清真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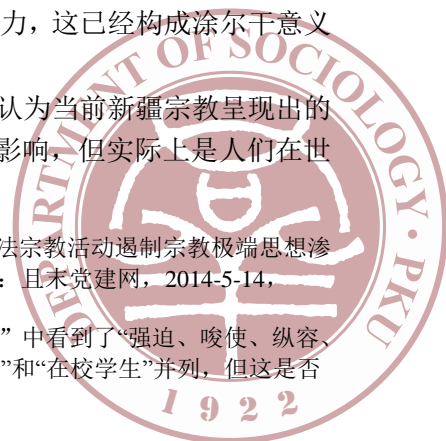
编号04：我觉得他们管得实在太宽了，很多事情都只是一点个人的私事，但是他们会上纲上线，夸大成为宗教问题。我们回新疆的时候，都要把手机里的照片、信息删掉，一点关于民族和宗教方面的都不敢留。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敢用苹果手机，因为它相册里面删除了还会保留很多天，有些警察在检查手机时特别贱，连删除的记录都会去翻看。还有的时候，我们被要求留下来检查，如果遇到长得好看的，他们就会拦下来故意不让走……在新疆，很多基本的法律一点用都没有，他们只管宗教问题和恐怖分子。

编号07来自喀什某县农村地区，当笔者问到他平时是否做礼拜时，等来的却是很长一段沉默，然后他才比较犹豫地解释道，“我其实特别想做礼拜，但是我们那边查得太严了”。这说明他内心觉得自己应该做礼拜，只是迫于严厉的约束而无法完成；他一直以为只要是学生就不能进清真寺。²当笔者询问编号04，对这些现象不满时是否会去反映时，她表示毫无办法，在其家乡当地人都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为“都很害怕”、“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然后被关起来”；她讲述了当地人在面对这形势时表现出“人人自危”、“任何人都不相信别人”等。且不说这些信息是否属实，但透过这些回答可以感到受访者沉重的心理压力，这已经构成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是需要引起注意和进一步分析的。

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宗教具有慰藉心灵的社会功能。有受访者认为当前新疆宗教呈现出的“复兴和活跃”，表面上看是全球伊斯兰复兴和境外极端主义势力的影响，但实际上是人们在世

¹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新党办发【2013】11号）”百题问答，参见：且末党建网，2014-5-14，<http://qmx.xjkunlun.cn/tgz/zcfg/2014/515095.htm>

² 笔者确实从“自治区11号文件”中有关“非法宗教活动26条界定的具体内容”中看到了“强迫、唆使、纵容、放任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这一条相关内容，其将“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并列，但这是否



俗生活中的种种遭遇让人们不得不转向宗教。编号 08 结合自身的宗教体验和观察，认为当人们遇到问题而无法解决时，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更加虔诚地做礼拜”、“向安拉祈祷”成为最好的选择。因此，看待宗教问题时需要注意其俗世生活的土壤。这种俗世生活的“土壤”不仅仅是指维吾尔族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社会事实，如失业率高、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的族群分层等¹，还表明维吾尔族在特定政治环境之下“压抑、逼仄”的“心理事实”，宗教是其纾解心理压力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呼吁“应更重视维吾尔社会心理研究和疏导”，消除维吾尔族民众心中的“不安全感”（覃爱玲，2016）。

编号 08：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维吾尔族中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了。像我婶婶，我知道她以前只是每天做一次礼拜，但后来她哥哥生病了，她开始每天做五次礼拜，而且变得特别虔诚；后来她哥哥康复以后，她就没做了。这段时间她儿子被公安局抓走了，她又开始每天做五次礼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新疆的宗教复兴和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遭遇很相关，只有当人们生活不顺的时候，才会更多地求助宗教。再加上近年来由于政府严打宗教极端势力，本来只有一个恐怖分子，结果他抓了許多人，虽然可能最后把误抓的人都放了，当时在这个“一抓一放”的过程中，有多少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个人背后所关联的家庭又有多少人将心中的压力诉诸于宗教？所以说越是压制，反弹越是厉害，就像弹簧一样。

已经有学者从历史材料中总结，宗教的管制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即与压制相伴而生的是“牺牲”，从而使宗教变得更可信、更真实，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卢云峰，2010）。加强宗教管制的结果并不是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总体降低，而是可能导致宗教市场复杂化，出现所谓的“三个宗教市场”（转引自张文杰，2014）。当然，这不能直接推论出新疆宗教不需要管理、“极端势力”不需要打击；而是至少说明，政府作为宗教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能被排除在解释当前新疆宗教现象的范围之外，它不是“置身事外者”，而是与伊斯兰信众同样作为行动的主体，二者及其互动共同塑造了新疆的宗教生态。

编号 0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认为宗教就是问题，有宗教的存在就会有问题，所以他们想要“斩草除根”，以为可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是问题根源还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没有很好地执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存在问题，我们在宗教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一些方面还比较严重，我们一些人确实受到了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但这只是小方面的，是极个别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中间分子。但是如果这样的政策继续执行，就会使很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人数慢慢增多，规模也逐渐扩大，这些人就会去宗教上面寻求安慰；这样很多中间分子就会走向对立面，就会造成很多这类的事件。……新疆和内地这类事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社会治安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不公正问题。²

由于政府的无神论性质并深深卷入宗教事务之中，一些由政府主导的涉及“宗教”因素的舆情宣传，恰恰会进一步强化、明晰化社会底层的宗教意识，强化群体间的隔阂、猜忌、排拒的心理；因此，逐步让宗教信众理性化，引导宗教的常态化发展，使宗教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才是更为明智的做法。“依靠宗教自身的力量实现与现代化、世俗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思潮的衔接和适应是基本的经验和理路”（严庆，2014）。一些受访者表示基层政府还将民众家中正式出版的宗教类书籍没收，这类做法其实阻碍了信众获取正确的宗教知识，不利于信众宗教思想的理性化，

说明已成年的大学生也在此列，还需要进一步调研、分析。

¹ 从“六普”数据中可见，维吾尔族就业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在 2000-2010 年十年期间逆全国发展大趋势从 80.35% 上升到 82.74%；而在“党政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五个行业部门中，其人口比例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维吾尔族在十年期间跨区域流动明显放缓（参见马戎，2013b）。

² 本段材料引自笔者于 2014 年 3 月对北京某 985 高校社科专业一本本科生的访谈，该生曾就读于南京内高班。



最终难以脱离信教的盲目状态。从受访群体的情况可以看出，该群体对于伊斯兰教有基本的理解，他们掌握了良好的科学文化知识，是维吾尔族内部理性化、世俗化的重要力量，是抵制极端思想的新兴力量，因此这是应该团结、争取的力量。

三、被书写的历史和被叙述的历史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并非指过去曾发生的事实，而是一套被书写或被叙述的“社会记忆”；因此，社会学认为“历史”（无论是被书写的还是被叙述的）的真实与否并不需要特别关心，需要关心的是：（1）人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来叙述历史，（2）人们为什么更愿意相信这样的历史而不是那样的历史是“真实”。在“社会记忆”中，有一部分是以该社会所认定的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转的，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社会中各人群的认同与区分”，这部分可以称之为“历史记忆”（王明珂，2001）。换句话说，“历史记忆”是对现实状况的反应，或是“确认”现实，或是“解构”现实，本质而言是叙述者作为行动者试图通过历史在现实中进行“定位”的过程（positioning），是其能动性的体现。为了了解“民考汉”群体的“历史记忆”，笔者询问了该群体对维吾尔族历史的了解程度，以及维吾尔族在官方书写的历史和民间被叙述历史之间的张力。其基本呈现三种样态：

其一，对历史“不感兴趣”或者“了解不多”。以下三名受访者均为大学低年级学生，其中两位是理科生，坦言自己对于维吾尔族以前的历史不感兴趣，也没有刻意去了解，只是觉得作为维吾尔族应该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免被人问及的时候显得“尴尬”。这符合常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社会记忆研究的反思中，有学者曾指出社会记忆研究中可能存在权力观下的“虚假对立”，即在权力观的影响下研究者认为必然存在“民间记忆”和“官方记忆”的对立或者“大众”与“精英”的分野；但在现实中，两者的对立并没有如此强烈，因为二者可能是互构和共谋的（刘亚秋，2010）。因此，受访者对于历史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国民教育中的历史“不太在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也“了解不多”，这属于常人对历史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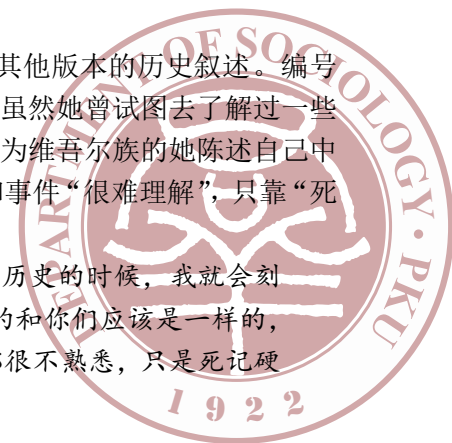
编号 02：至于维吾尔的文化和历史方面，我曾经百度过，但是了解不多。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惭愧，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虽然总是给同学们说新疆多么有特色，但是我了解很少，没办法和他们讲，哪怕是作为一个导游都有点不合格。

编号 04：我对维吾尔族以前的历史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现在慢慢地对我爸爸生活的那个时候感兴趣了，他总是给我讲他们当时的生活和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编号 05：不太了解，只是从初中讲的新疆地方史中了解过一些。平时爸爸也会给我讲，但我也觉得那些不太可靠。他平日里会提到某个我们民族著名的诗人，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就比较失望。（**那你觉得历史重要吗**）重要啊，要是别人问起我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一问三不知，多不好。别人见我是维吾尔族，肯定要问我关于维吾尔族的东西，结果我啥都不知道，就不好了。

其二，对维吾尔族历史的官方书写版本比较熟悉，同时不知道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编号 10 从事考古研究，但其主要工作在于发掘无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虽然她曾试图去了解过一些不一样的历史，但是“正式出版的东西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维吾尔族的她陈述自己中学刚开始接触历史时，由于文化差异而表示历史课本中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很难理解”，只靠“死记硬背”。

编号 10：小学的时候接触历史比较少，到了中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去找关于维吾尔的历史。但是发现只有西域的历史，我们学习的和你们应该是一样的，从夏商周一直到元明清，但是当时我很难理解，对于这些东西都很不熟悉，只是死记硬



背。你们可能小时候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对于其中的历史人物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当时也只是比较好奇，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就过了。上了大学以后，慢慢地我也看一些维吾尔族的历史，维吾尔的和汉语的都看，都是些正式出版的，两种文字也大致都一样。对于民间叙述的历史，我接触的很少，因为爸妈也不懂这些，也没法和我们讲。

其三，对民间叙述历史有所了解，或者对官方书写的历史表示质疑。这套民间叙述历史的基本框架是：（1）强调维吾尔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汉文材料中关于“回鹘西迁”的历史只是维吾尔族形成的一个晚近事件；（2）从土耳其到新疆这一广阔区域的民族都曾是一个祖先，因此目前这些民族都是“兄弟之族”，而且维吾尔族是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这套历史叙述基本没有超过上世纪80年代末被大加批驳的“三本书”的范围。¹当时的批驳着力点在于说“三本书”歪曲事实且“居心不良”，然而正如本部分一开头就指出的那样，历史的“真实”与否无关紧要，且不说“历史真实”仰赖于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因而本身就具有争议，人们通过重塑历史并非想要获取“真实”，而是想要表达对现存秩序之下自身“定位”的不满，所以指摘其真实性本身根本无济于事。

编号01：我历史学得很好，对我们的历史了解也很多，但和历史教科书上讲的不一样。小时候，我爸爸经常收听乌兹别克斯坦那边的电台，他给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大概就是，我们在十万年前从伏尔加河畔东面迁到了蒙古高原，后来才是回鹘西迁的那段历史。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我们才分化出了后面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等；这些国家和我们以前都是一个民族，就是突厥。……以前在中学历史课上，老师总是否认突厥是一个民族，而说它只是一个地名，不存在这个民族。我一点都不相信，而且非常抵触，我宁愿相信电台里面说的。

如编号01所述，自己获取这些知识的渠道在于家庭教育和国外电台。他之所以选择相信这一套历史，主要是他对现在官方书写的维吾尔族历史不满；他认为官方只是强调了汉族的历史，而维吾尔族的历史在这套书写中被贬低和否认。当笔者讲述了“突厥”作为一个族群集合体的历史存在和作为一个语族概念的现代意涵以后，他表示“这样的说法比较能够说服自己”，解开了他心中对于是否存在突厥这个民族的疑惑。换言之，并非是他对维吾尔族历史具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极其偏执的情感，只是他对“正史不正”而丧失信心。

编号06：维吾尔的历史资料已经找不见了，都看不到。反正我看过的那些教材都是与汉族这边有关系的，就是什么时候这边朝代在那边建立什么，这边和新疆关系怎么样。但是维吾尔族以前也是有朝代的啊，这些资料我就没见过。我主要是听小说，听维吾尔族的一些小说。我知道的维吾尔族历史也没法给你讲，有些专有名词也没法和你说。我看到的是，草原上的民族有一部分人迁到吐鲁番，有一部分人迁到南疆，建立了王朝；后面又被一个民族灭了。……我们历史教科书上一点都没有。我们初中时上过新疆地方史，就一本书，书的开头就讲张骞出使西域，第二个讲班超，后面讲唐朝在这边建了什么，再后面又是元朝、明朝、清朝，然后就没有了，这个算新疆历史吗？感觉没意思。我们书店里面都没有。我们以前老师都认为，匈奴是我们维吾尔的前身。反正是对维吾尔历史我特别迷茫，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历史能相信吗？但哪些历史能相信，就不知道了，历史都是这些当朝人写出来的东西，能信吗？那个人说维吾尔族有八千年

¹ 这“三本书”分别是维吾尔族当代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在1986年之1989年先后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维吾尔人》，作者总体的写作意图是为伟大而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民族书写自己的历史，他将维吾尔的历史起源追溯至八千多年前。（参见姚新勇，2014）这一历史叙述直接引起了学界的强烈批判，单是1991年直接批驳这三本书的论文就有25篇之多，典型如“《维吾尔人》一书”、“《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错误性质”、“《维吾尔人》的作者伪造历史，鼓吹分裂主义思想的实质”、“历史岂容篡改，谎话必须揭穿！——驳《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歪曲篡改新疆各民族历史的谬论”、“《维吾尔人》是唯心史观的产物”等。（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搜索）

历史，汉族才五千年历史，这个能让出版吗？我也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可信。要是我写的话，要是八千年，也别写八千年了，写成这样还给我们带来后患。

编号 06 叙述自己虽然作为理科生，但是阅读历史是作为自己的一项兴趣爱好，他通过阅读一些小说来了解历史，但是自己对这些历史的前前后后并不完全了解，他对官方书写的历史也表示质疑，觉得那些历史只写了“与汉族有关系”的历史，忽视了维吾尔族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地位。在这种“先见”下，其基本预设就是“凡是正式出版的都是不可信的”。

该群体中对于本民族历史的认识呈现一定的分层。虽然在本次访谈中第三类认识表现不多，但是值得重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当前中国官方民族史的书写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观来展开，但依然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历史书写中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观依然比较主流，以“生产力”为标准划分社会历史形态。这种历史观运用在民族史上，往往就会出现汉族是最为“先进”的，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落后”的印象，少数民族的出路在于“向汉族学习”或者“成为汉族”，这给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一定不满和恐慌心态。

第二，“中原中心观”影响下的华夷秩序未经挑战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中，“华夷之辨”虽然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但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后，这一区分逐渐转变成为“种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中只强调各边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如果没有这份“互动”，边疆地区则是“无历史”的。另一方面，在现行“民族”认知框架下，人们往往将中原王朝对应于“汉族”的政府，于是将其简单对应于“自身”与“汉族”的关系，看到的历史过程就是“汉化”，这恰好造成心理的“逆反”。

第三，以“族源”追溯的方式“分族写志”，往往要么只强调某一民族单独发展的历史，要么只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缺乏各少数民族内部的互动历史，容易造成一些“认识误区”，即认为只有汉族才是各民族融合而成的，但其他少数民族则是“纯种”民族。这为“追求纯种，盲目排外”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四，“以今论古”的倾向明显，即强调以今日政治观点去论证、裁剪历史问题，影响了历史书写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这些问题中最主要表现为“中原中心观”和“单线进化论”，理想的历史书写应该更加侧重于“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历史”、“各民族共同开发神州大地”，应该更多表现历史中多民族的互动，以为各民族在当代中国的平等地位奠定历史基础。

四、对自身和维吾尔族前途的想象和预期

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是少数民族的教育成功，即分析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解释是由奥格布（John Ogbu）提出的“民间成功理论”（Folk Theory of Success）：如果少数民族成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达到成功的话，那么他们会想出办法来克服由文化分歧带来的障碍；相反，如果他们认为教育体系仅仅是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自我认同，而没有在更广阔的社会交流中给他们同样平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做出抵制的反应（Stevan Harrell & Mgebbu Lunze, 2011[1999]: 179）。他进一步区分了“自愿移民少数群体”和“非自愿移民少数群体”，指出两个群体在如何看待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与学校环境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上有所不同，前者更为乐观，后者则表现为悲观（哈经雄，滕星，2001: 57-98）。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并非移民，但这个理论可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少数民族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教育对于自身社会流动的作用，对于其自身的成功与否具有较为关键的影响。换言之，在没有制度性障碍的前提下，重要的不是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所存在的所谓“客观的文化差异”，而是少数民族如何看待这种“文化差异”，其态度的不同带来了在学习上的不同策略（祖力亚提，2009b）。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教育，其最后的产品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思维的训练和人才的培养等，它还生产了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预期¹，也就是对于社会流动的期待。有学者指出，如果这一预期与其实际的社会流动不相符合、而且差距越拉越大，则会产生“结构性失位”，进而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张静，2010）。因此，本部分关注的是“民考汉”大学生对自身的前途有何预期，如何看待维吾尔族在整个国家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其自身的民族身份与其成功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也对维吾尔族的前途持乐观态度。这部分人表示虽然听说过有人因为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而遭遇不便，但没有亲身经历过。对于工作地点的选择，大部分表示自己对于地方没有特别要求，但会比较愿意回到新疆（多为乌鲁木齐），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方便照顾父母、饮食等方面更加方便等，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大致相符（参见欧登草娃，2014：184-87）。

编号 02：我爸妈当然希望我有一个 better life，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这一辈人可以供我和我妹妹上学，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也算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了。那么，到我这一代以后，至少可以提供更好地生活，可以很轻易地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提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目前还是打算回新疆，并且希望生活在学校围墙里面，以后从事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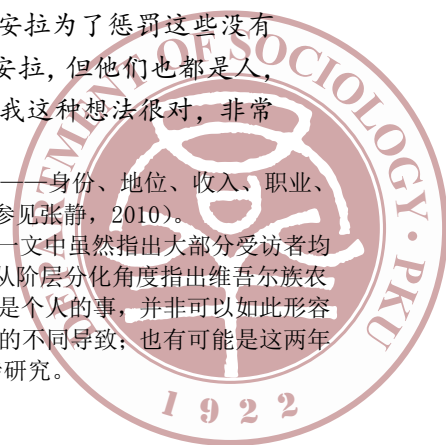
编号 03：我对新疆的前途是很乐观的，感觉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但是可能有些生活方式没有跟上……我以前一直都想回和田，因为家人都在那里，但后来我有点犹豫了。（为什么犹豫了？）觉得和田发展太慢了吧，在那边发展平台很小，所以可能我以后会去乌鲁木齐。对于乌鲁木齐，我其实只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对那儿了解也不多，但还是会感觉更加亲切，比起北京，在交流和饮食方面会更加方便。

此外，还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去到“更加自由”、“更加平等”的地方。这需要引起特别注意，对于不同人给出的理据，需要作进一步细致区分。第一类，如编号 01 所描述，虽然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获得成功；但他对于维吾尔族整体的前途表示担忧，因为在他看来，维吾尔族人“比较懒散”²、“不像汉族学生那样拼命学习”，而且认为维吾尔族“历史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总是被别的民族统治”。他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一词总是被贴上“落后”、“弱势”和“被照顾”的标签，这本质上是一种与“汉族”不平等的“区别对待”。为了逃避这种群体性的负面“标签”，他渴望去到凭借自身能力、人人平等的地方生活。

编号 01：我想走出中国，去任何一个国家都好，我不希望总是被别人看成不一样的存在，被贴上“少数民族”的标签。我感觉只要我还在中国，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就好像是低人一等一样。在中国，好像只有两个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上内高时，我从情感上不愿意离开新疆部，但最后还是去了本部，因为我想和大家变成一样，不希望和别人不一样，被人区别对待！……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被首先当成人来，而不是分民族。记得当时汶川地震时，我们那边很多人就说，这是安拉为了惩罚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当时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无论有没有信仰安拉，但他们也都是人，都是安拉的造物啊，他们受灾了也很可怜啊。当时我爸爸就夸我这种想法很对，非常

¹ 这里的“社会地位预期”是指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人群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预期，它是由现实社会结构所生产出来的，具有“非个人性质”（参见张静，2010）。

² 需要补充的是，在我另一篇《维吾尔族在校大学生访谈》（撰于2014年4月）一文中虽然指出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维吾尔族“懒”，但在本次访谈中，多数学生不认同这一说法，他们大都从阶层分化角度指出维吾尔族农民因为缺乏工作机会而如此表现；或者认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勤懒之分，这是个人的事，并非可以如此形容一个民族”等。这两次访谈得出结论的差异可能是受访者所学专业 and 所在学校的不同导致；也有可能是这两年内发生了一些较为重大的事情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不过，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赞同我这种想法。

第二类，对于新疆带有较强的文化和民族情感认同，对新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是不喜欢新疆当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编号 04 曾在内高班（威海）学习，去过内地较多地方，对内地和新疆经常对比，认为新疆政府“太严格”，表示希望可以去到内地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生活。但同时，出于对于文化的认同和强调，她又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有维吾尔人的地方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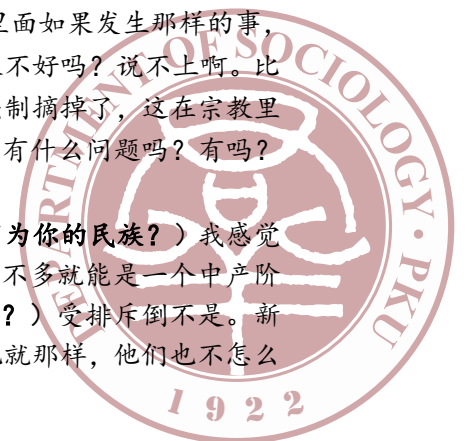
编号 04：（你以后打算在哪儿工作？）去徐州吧，看我男朋友以后在哪儿发展，但我们都希望以后在内地工作，回新疆被管得太过了，生活很不舒服。我爸爸一直都希望我以后别回新疆了，说当地管得太严格了，我们都没有基本人权了。……但是等我有孩子了以后，我还是会回新疆。主要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啊，我想我的孩子以后能在有维吾尔族的地方成长，不能完全丢失了我们民族的品质。（你打算去国外吗？）我打算去国外读研究生，但是不会去国外定居——干嘛要去国外啊，我们中国这么好！

我觉得政府在经济这一块做得很好，特别是“援疆”这些事，而且现在政府出台政策解决就业，说企业解决当地人就业的话，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贷款，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现在企业也必须有“五险一金”，大家就不用都去考公务员了，可以去企业，我们新疆现在有很多民族企业了，我看到这些很高兴，就像看到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去发展很好很高兴一样。……刚才你问我担不担心维吾尔文化没有了，我之前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有人告诉我，政府在搞同化，要取消维吾尔文字什么的，但是我看到企业发展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文化不会消失，因为这些企业有很多是用维吾尔文写的。

第三类，对于维吾尔族和自身前途表示担忧，认为维吾尔族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缺乏发展空间，表示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难以获得成功。编号 06 出身于农村地区，所在社区人口超过 90% 都是维吾尔族，他对当地政府一些形式主义的粗暴执法极为厌恶，认为政府的行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普通人的生产和生活，“每周集中开会”、“思想教育”等导致人们无法正常流动、劳作。他一方面肯定中央出台的政策，但同时也认为这些政策“没有真正落实下去”，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新型城镇化”，当地人们都没有受益，反而生活日益贫困，因为“当地干部们也不怎么关心民生”。同时，他对自己的民族也抱有较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新疆不断出事在于“我们民族比较激进”，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被地方政府一些具体做法“逼出来的”。虽然编号 06 是一个个案，但其中透露出的问题比较严重，如果个体将自我的失败归因于非个体因素，即结构性因素，那么一个群体的被剥夺感随即创设出来，对于社会稳定有不利影响。

编号 06：你说，一个中国吧，本来就不让我们民族好好发展。……我不知道政府到底怎么想的，我感觉真没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国家里面，一个民族占了大多数，一个民族主导，另一个民族必然是靠边站的，从根本就没得解决。（你觉得是整个中国不让维吾尔族好好发展吗？）我感觉是，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吧，也是比较极端、激进的民族。（你觉得是整个民族吗？）感觉有些人是，虽然我不激进吧。但是政府干的一些事，我也看不惯。政府这样做，谁都看不惯啊。就比如你们村里面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你也会看不惯的，对吧？有些人看不惯就起事，你能说是这些人不好吗？说不上啊。比如我听说，和田一个信仰特别虔诚的人，戴着面巾上街，就被强制摘掉了，这在宗教里面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当天就起事了。你能说这个方面她有什么问题吗？有吗？说不上，对吧？这样弄一个出十个。

（你觉得自己前途不明，这是由于你自己的出身呢，还是因为你的民族？）我感觉是我的民族原因，因为我是个维吾尔族。如果我是个汉族，我差不多就能是一个中产阶级，但是维吾尔族就不咋样。（是感觉作为维吾尔族会受排斥吗？）受排斥倒不是。新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在村里面干了一个月，感觉村干部也就那样，他们也不怎么



关心民生。

第四类，看到维吾尔族目前遭遇的一些“不公平待遇”，自己也亲身遭遇过一些偏见和歧视，但是表示可以通过每个人的个人努力和成功，逐渐改变维吾尔族整体状况，最终可以在整个社会中获得相应的社会承认。换句话说，这部分人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成功就是整个民族的成功”。

编号 10：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一帆风顺，也遇到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当时我可能会很不高兴；但是回过头来一想，也没办法，只能慢慢去改变。（你对这种改变的前景还是怀有乐观的吗？）维吾尔族，还包括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这样就会一代代去改变。也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回到新疆去工作，发现自己家乡并不适合自己的发展，感到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在新疆找工作，很多单位，包括公务员，其招聘信息的括号后面都会标注只招汉族、或者只招维吾尔族。毕竟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很多人对于民族这件事儿很敏感，经常注意到这些，容易拿民族来说事儿。

但是我想，只要你做得很优秀，非常有水平，你肯定还是会有 access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个人比较赞同的是，个人不一定要回到新疆才能为新疆做贡献，其实你在哪儿发展得好，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你永远都是新疆人，别人也会看到这是新疆的小孩获得了一些成就，慢慢大家就会认可这个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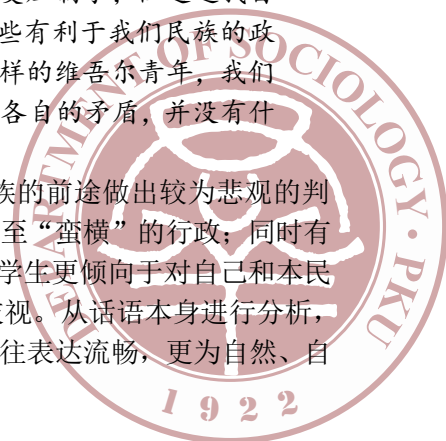
由于本次的访谈人数有限，笔者不能给出哪些因素影响了该群体的认知和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是由于“民考民”和“民考汉”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引起的，而极有可能是基于受访者所属的阶层。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笔者特意访谈了北京另外某 985 高校的“民考民”同学。编号 09 出身于距乌市不远小县城的商人家庭，一直在“民考民”系统读书，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目前国家基于民族身份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作为个人应该抓住这些机会。同时，他也认为在新疆，由于当前“维稳”的严峻形势，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其衡量人才的标准极为单一，“就业的时候他们看重的只是一点，就是汉语好；要是汉语不好，那就啥也不是”。

编号 09：虽然在新疆，作为维吾尔族，一把手当不了；但是只要你努力，二把手还是可以当的；如果是在内地，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可以不受民族身份的影响，像我们很多老师，他愿意每天来办公室干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他。但如果在新疆，因为它一直强调稳定，就会不停地让人去开会、值班、维稳，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自己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格外受到优待。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有很多机会，我感觉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很强而得到，而仅仅是因为我是个维吾尔族。比如校团委找我谈话，说我们学校的维吾尔族是学校的第二大民族了，所以学生会需要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副主席，问我愿不愿意做。还有这次参加北京团市委党员骨干培训，全北京 53 所高校只选了 120 名同学培训，我们学校只选了 3 个人。我知道他们选我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个维吾尔族。我有时候想，要凭借自己真正的能力去获得机会，但好像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于这个民族身份。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们民族当中现在抱怨很多，都觉得受压制了；但通过我自己的例子，我感觉我们还需要换一种思路，就是国家也在出台一些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政策，像我被选拔去接受培训，就说明他们很需要培养一些像我这样的维吾尔青年，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如果一味地抱怨，其实只会加深各自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好处。

从目前情况来看，出身于农民阶层的学生更容易对自己和本民族的前途做出较为悲观的判断，其给出的理由大都在于亲眼目睹基层政府在农村的混乱、低效乃至“蛮横”的行政；同时有更多人表示自己亲身经历过民族歧视；而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对自己和本民族的前途做出更为乐观的预期，也更少表示自己经历过民族偏见和歧视。从话语本身进行分析，前者在表达的时候更容易不自信，其说话语句细碎、片段；后者则往往表达流畅，更为自然、自



信。基于自信和期望的不同，这两个群体是否会在以后的发展中走向“自我实现的语言”？这是否反映出维吾尔族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面临的政治环境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是否塑造了各自的性格、认知和判断？在当下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是否会造成维吾尔族内部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断裂？如此，基于民族身份的各项政治安排是否会固化这些阶层差异，并最终固化社会流动，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哪部分人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成功了以后是否有利于带动整个民族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分析才能给出比较可信的回答。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访谈，展示了维吾尔族“民考汉”在校大学生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对于前面各部分已有的小结，这里不再重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于该群体有了总体性的认识，至少应包括：

1. “民考汉”学生由于自小在汉语学校学习，其对于本民族语言、历史以及伊斯兰教等方面了解和熟识程度有限，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学习本民族语言、了解本民族历史以及保持伊斯兰的宗教信仰很重要，这是其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群体绝非保守排外的群体，在长期与汉族老师、同学交往交流当中，他们学习汉语和英语等具有同样的开放心态，其对于本民族历史的追求更多是确立本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平等地位，伊斯兰教的信仰也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身份而存在。

2. 该群体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权利，他们对于个人和维吾尔族的前途大都持乐观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疆目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氛围表示倍感“压抑”，他们容易将新疆与内地作比较，希望可以在“自由、包容”的氛围中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可以超越“民族性”而代之以“个人性”，如在交朋友中不以“民族”为主要判断原则而主要根据其性格和爱好；在竞争当中不是仰赖于“被照顾”的民族标签而依靠自身实力获得成功；在强调团结的时候更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而不是“三个离不开”式的“民族团结”。根据匮乏假设和社会化的相关理论可知，人们早年社会化中缺乏的基本内容往往成为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在经济快速且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其物质基本可以得到保障，因而其珍视的价值会从“物质主义”转变到“后物质主义”，亦即“归属、受尊重、知识和审美的需求”会不断凸显（英格尔·哈特，[1997] 2013: 31-35）。本次访谈的10名学生基本属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年，其个体性、自主性不断增强，与当代青年群体主流人群相差无几。

因此，在面对这样一群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的群体而言，我们的社会治理政策的执行方式、目标理念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不仅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需要尊重每个人作为人的自由、尊严，为每个人创造自由平等的发展权利。目前，新疆政府为了预防极少数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和暴力活动，维持必要的警力是现实所需，但有学者指出，“如果在‘维稳’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人们的基本文化认同、宗教行为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对立起来，那么国家的强力措施甚至有可能强化人们心中的某些观念和情绪”，因此“真正的‘维稳’是要把工作做到人们的心理，使人们敢讲真话、敢提意见，并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切实解决或合理解释来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人们生活的公平感和幸福感”（马戎，2014: 55）。

3. 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流动频繁、信息获取渠道多样，如果存在人们（少数民族）与政府（主流群体）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人们（少数民族）更倾向于相信对立一方的信息。访谈中，“民考民”在校大学生多次向笔者展示其朋友圈内转发的各类涉及民族类的文章和信息，比如“自动取款机由于点击使用维语的人数不够而将取消维语”、“维吾尔语是被联合国列入五百年会消亡的语言”等，这些“精心策划”的谎言，虽然没有多少实在证据，但有些人会出于民族情感而在短时间内接受、传播。随着他们掌握更多中立性的信息，他们最终可以依靠自己的智识做出正确的判断，表示“对这些信息都不愿意再看了”。因此，引导这部分具有较

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知，需要的不是控制信息的传播和“空洞、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需要更加中性的、去除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多样化、差异化信息，该群体的理性思维足以做出理性判断，并且还是辟谣、说服他人的重要力量。

4. 访谈中还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学生对本民族目前的处境具有“自卑和自尊”的矛盾心理，他们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认为“我们民族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民族”，同时基于自身的民族情感和实际经验又认为“有些人是被政府不恰当做法逼出来的”；更有一些人认为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无法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适当的位置。批驳这些认识的正确与否意义不大，首先需要的是分析他们何以产生了这些认识。这部分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基层政府“严密、威权，乃至蛮横”的管理方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自小离开家乡而到较为封闭的内高班学习经历，使其对内地了解甚少，如果再加上内高班教师有意无意地偏见歧视，最终形成了这部分学生“压抑”、“自卑”的心理状态；他们进入大学后，普通高等院校一般不会特别注意其独特的民族身份和成长经历，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纾解渠道和机制，致使这部分学生早年形成的一些不正确想法一直未能得到冲击和更新，这最终会影响他们对自身和本民族未来的预期，进而对其自身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如此，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弟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其未来发展也终将受到限制，对于化解严重的阶层分化是极为不利的。

文章最后有必要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民考汉”在校大学生他们作为未来的精英分子，其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到底是整合还是区隔？这取决于这些精英分子到底属于什么类型。戈登（[1964]2015：212-213）将“知识分子”在面对“族性”（ethnicity）和“知识分子主义”（intellectualism）二元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区分为三种“理想型”：“活跃积极的族群知识分子”、“被动消极的族群知识分子”和“边缘的族群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将自己保持在所属族群范围之内，并且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族群上；第二类他们基本上保持留在自己所属族群的亚社会边界之内的同时也偶然跨越族群边界去接触其他知识分子；第三类则将自己的族群性看得很淡，往往在自己所属族群圈子之外交朋友，甚至缔结婚姻。戈登认为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形成“知识分子亚社会”的重要前提。毫无疑问，该群体内部差异较大，无法将所有人完全划入以上中的任何一类，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族群性看得很淡，希望可以被视为最基本的“个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己所属的族群圈子（交朋友的较多，但是婚姻选择圈子还比较严格——主要基于宗教的考虑）；但同时他们又对自己的族群怀有文化上的认同，对自己族群的语言、历史以及前途表示担忧、关心等。看待“知识分子亚社会”这个理想型的亚社群问题时，不仅要看到族群知识分子自己能否超越自己的“族性”，还必须看到在全社会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以及价值理念中是否已经超越了“族性”来处理相关问题。如前所述，很多人不得不在众多有关族性（ethnicity）的盘问之下去了解、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因此，“整合与隔离”本质上是个人与结构互动的结果。

借鉴戈登对“去隔离化”（desegregation）与“融合”（integration）两个词语做出的细致区别¹，如果我们觉得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整合进入主流社会是维系主流社会稳定、健全的正确选择，那么，公共政策部门需要努力做的就是“去隔离化”，即去除一切阻碍各民族交流、迁徙的体制性障碍，而不是采取行政措施加速各民族的“融合”。因为“融合”应该属于自然发展的社会进程，“越俎代庖”、“拔苗助长”都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是“乐见其成”。

参考文献：

¹ “去隔离化”是指在公共或半公共设施、服务部门、制度机构的运行中消除种族标准，从而使每个人获得作为一个完全“公民权利”（civil rights）的法律地位和资格；“融合”则是指消除了偏见和公共生活中的歧视，包括了态度的转变，以及消除恐惧、憎恨、猜疑、刻板印象和迷信等，其所包含的内容要更多。前者属于社会学中立的陈述，而非基于某一些价值体系得出的“哪个是好的或是坏的”判断。（参见戈登[1964]2015:228-29）



- [德]韦伯, [1904] 1982,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韩水法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美]戈登, [1964] 2015, 《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种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 马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1997] 2013,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严挺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Stevan Harrell & Mgebbu Lunze, 2011[1999], “民间成功理论——汉族并非永远是最优秀的”, 载白杰瑞 (Gerard A. Postiglione) 主编, 《文化·教育与发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 滕星、马效义等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迪木拉提·奥迈尔, 2001, “新疆的‘民考汉’与哈萨克斯坦的‘民考俄’”, 载马戎等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哈经雄, 滕星, 2001, 《民族教育学通论》,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李儒忠, 2013, “论‘民考汉’”,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第 2 期。
- 刘亚秋, 2010,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社会》第 5 期。
- 卢云峰, 2010, “苦难与宗教增长: 管制的非预期后果”, 《社会》第 4 期。
- 吕大吉, 1987, “关于宗教问题本质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马戎, 2010,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
- 马戎, 2013a, “知识分子在社会族群结构和族际交往中的角色——读戈登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 《社会科学战线》第 7 期。
- 马戎, 2013b, “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 马戎, 2014, “21 世纪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战略”, 载《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35-61 页。
- 欧登草娃, 2014,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关于“内地新疆高中班”的综合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未刊稿)
- 覃爱玲, 2016, “应更重视维吾尔社会心理研究和疏导”, 微信号“塔里木观察”, 5 月 3 日, http://mp.weixin.qq.com/s?biz=MzI3MTExNDZlNw==&mid=2247483654&idx=1&sn=da78555523307e0e937659710c86fcbe&scene=2&srcid=0503Wx3SwOPZi5LGP4EuAOmr&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 吐尔文江·吐尔逊, 2014, “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68 期, 9 月 31 日。
- 王明珂, 2001,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历史研究》第 5 期。
- 希日娜依·买苏提, 2001, “‘民考汉’与双语现象”, 《语言与翻译》(汉文) 第 1 期。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 2016, “开展‘去极端化’引领信教群众正信正行”, 《中国宗教》第 2 期。
- 严庆, 2014, “引导和促进新疆宗教常态发展” (未刊稿)。
- 姚新勇, 2014, “‘大维吾尔文明’的穿越抑或建构? ——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及其批判”, 《二十一世纪》第 10 期。
- 张静, 2010, “社会身份的结构失位问题”, 《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张文杰, 2014, “中国宗教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尝试——评《中国的宗教》”, 《社会》第 3 期。
- 孜维达·阿不都克里木、买热巴·买买提、卡哈尔江·阿布拉, 2014, “双文化选择下的多元社会认同研究——为被贴‘汉化’标签的‘民考汉’群体辩护”, 《新疆社会科学》第 2 期。
- 祖力亚提·司马义, 2009a,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 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西北民族研究》第 3 期。
- 祖力亚提·司马义, 2009b, “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成功——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研究”, 载马戎、郭志刚主编: 《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